

话语的对话性与诗学问题

——巴赫金话语理论研究之二*

刘 晗, 粟世来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话语具有对话性是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核心思想。对话性体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 话语在称述自己的对象的时候, 会与他人话语产生对话; 其次, 话语的对话性体现在话语的说出总是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 以获得应答与对话为目的。根据话语对话性在形式结构形态上的呈现与否, 巴赫金将文体作了小说与诗歌的划分。在此基础上, 巴赫金认为, 与自然科学相比, 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本质特征就在于它们以话语作为存在方式, 且具有一种内在的对话性。

关键词: 巴赫金; 话语; 对话性; 小说; 诗歌; 人文科学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8)06-0057-07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ZC115)

作者简介: 刘 晗(1976-), 男, 湖南祁阳人, 文学博士,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粟世来(1976-), 男, 湖南芷江人, 文学硕士, 助理研究员,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巴赫金以“超语言学”命名的话语理论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将语言哲学研究的对象从语文学传统中脱离出来, 把活生生的言语交际作为其研究对象。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关注的主要是语言的形式、结构或者静止的因素, 但超语言学关注的则是语言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一些内在的特征和本质规定性。巴赫金认为, 话语就其本质而言的特征就是对话性。对话性将话语与语言, 将超语言学与语言学区别开来。在巴赫金看来, 在逻辑性的语言结构体系中不存在对话关系, 在语言的逻辑范畴之间不存在对话关系, 在各语言成分之间也不存在对话关系。对话关系只存在于具体的语言使用中, 存在于具体的话语中, 没有话语就没有对话性。在此基础上, 巴赫金将话语具有对话性的思想作为一个逻辑起点, 带入到他的诗学等人文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诚如克拉克与霍奎斯特所指出的那样, “巴赫金无论是在自己名下还是在别人名下的全部著述都是这种一般语言理论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1](P242)}

就此而言, 话语的对话性思想对于巴赫金来说, 就成了他所有著述的基本思想内核。要理解巴赫金, 就必须回到他的这个理论原点上上来。

一、话语内在对话性呈现的两个层面

在巴赫金的话语理论中, 巴赫金在话语概念中注入了语言学模式排斥的主体。所谓话语就是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展开和存在的。而且“每一段话语都有意或无意地与先前同一主题的话语, 以及它预料和明示的将来可能发生的话语产生对话性。”^{[2](P172)} 巴赫金关于话语的对话性从本质论上的阐释正是从这两个层面展开的。

首先, 话语在称述自己的对象的时候, 会与他人话语产生对话, 具有对话性。传统的语言哲学、语言学, 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修辞学视野中的语言是没有主体的语言和封闭的语言。它们只知道观

* 收稿日期: 2008-09-28

照封闭的语言本身,而不顾这些语言的周围还存在着其他的语言。巴赫金发现在实际的语言生活中,语言的真实状态并不是这样:“在话语和所讲对象之间,在话语和讲话个人之间,有一个常常难以穿越的稠密地带,那里是别人就同一对象而发的话语,是他人就同一题目而谈的话。活生生的话语要在修辞上获得个性化,最后定型化,只能是在同上述这一特殊地带相互积极作用的过程中实现。”^{[3](P55)}也就是说在说话人(主体)与讲述的对象(生活世界)之间,话语是一个桥梁,主体以话语作为媒介建立起自己同生活世界的交往。每一个主体用何种话语来指称生活世界中的对象,以何种情感基调来讲述这个对象,这都是他同他人话语对话的结果。他在用话语指向这个对象或者论题之前,这个对象或者论题已经被他人话语表述过了。

这些他人的话语或隐或显地弥漫在这个对象的周围,阻挡、蛊惑或者敦促另一个话语主体对这个对象的表述,同主体的话语选择产生着积极的对话。这个已经出现在他人话语中的对象,已经被充分评价化和情感化。这个对象本身被充满情感语调化的话语所包围。话语主体在进入这个充满了他人评价话语的中间地带的时候,在这些众声喧哗的话语群中,主体带着自己的价值评价,要赞同一些话语,同时还要排斥一些话语。主体同所有的这些已经存在的关于这一特定对象的话语产生对话,同他们产生积极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认同与反对是同时并存的。根据自己跟这些已经存在的社会性的杂语,即其他的话语声音,来选择属于自己的话语,与此同时,将这些话语赋予属于话语主体的特定的情感语调。这时“话语在穿过他人话语多种褒贬的地带而向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情味深入的时候,要同这一地带的种种不同因素发生共鸣和出现异调,要在这一对话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修辞面貌和情调。”^{[3](P56)}

话语具有特定的修辞面貌和情调,这是话语存在的真实状态。主体选择一种话语并赋予其独特的情感基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这个对象、这个论题、这个事件一种独特的理解。但话语表达不管如何独特,它还是以让别人理解为目的的。这样一来,话语主体必须使用一些他人能理解的话语。创造一种特立独行的话语,不能被任何人理解,话语作为交流的工具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从这个方面,巴赫金发现,其实我们使用的每一种活生生的话语,即便再

独特,也是打上了他人的烙印,是社会化的结果。完全没有被人使用过的话语或者完全属于某一个话语主体的话语是不存在的:

在接近自己对象的所有道路上,所有方面上,言语总得遇上他人的言语,而且不能不与之产生紧张而积极的相互作用。只有神话中的亚当,那个来到不曾有人说过的原始世界发表第一番言辞的孤独的亚当,才真正做到了始终避免在对象身上同他人话语发生对话的呼应。然而人的具体的历史的话语,却做不到这一点,只可能有条件地在一定程度上避开这种对话。^{[3](P58)}

这也就是说,在实际的话语过程中,话语在不断地同历史上存在的、他人已经使用过的话语进行对话,每一个具体的话语都是对前人话语的赞同、扭曲或者修改,从而在这种对话的形式中形成自己的话语。这种对话性是在称述对象的身上与他人话语相遇,是以一种内在的形式进行的,是话语对话性一个最为重要的层面。

其次,话语的对话性的另一个层面是指话语的说出总是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的,是以获得应答与对话为目的的。“陈述是在两个能交际的人之间成立,即使没有实在的对话人,人们也可以假设一个普通的代表人,一个代表包括发话人在内的社会团体。话语倾向于对话者,倾向这个对话者”^{[2](P234)}。话语的说出总是以听为先的,没有听众可能就没有说的行为,即便这个听众是假设的,这个假设也是必要的。“应该指出,语言行为既依赖于发话者,也依赖于受话者。语言行为就是有目的的行为,不仅因为发话者有达到某种目的的意图,而且也因为它被受话者视为具有某种目的的行为。”^{[4](P238)}也就是说,话语必须在这种双向的关系中才可能发生。而且对于话语参与的双方来说,领会彼此的意图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交际中真实的话语,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把目标指向下一步的对话。它刺激回答,猜测回答,考虑到对话本身来组织自身。”^{[3](P59)}话语以对方的直接回答为目标,而且所有的话语都是以可能的应答来组织自身的话语形式和给予话语以相应的情感基调。这种潜在的对话,影响说话者话语的风格和文意,反映到话语的布局结构上来。而且这种潜在的对话者可能做出的应答对于话语的存在形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话也好,作为话语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文学写作也好,在说和写之前,必须充分考虑接受者的态度、情感和价值取向。话语的存在形式

是为这些说话者或者写作者所预设的话语交往对象进行量身定做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作为一种话语,它也是具有对话性的。这种对话性是在于,一个特定的作家,他总是在为他想象中的读者进行写作,而不是为所有的读者进行写作。这种想象的读者,对于作家写作原则、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及其美学追求都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就是想象的读者的声音,他们要求作者怎么写,写什么。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考虑受众应答性的观念,与20世纪60年代在接受美学尤其是与德国美学家伊瑟尔的隐含的读者的观念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接受美学认为:“每一文学文本的构成都出于对其潜在的可能读者的意识,都包含着一个它为其而写者的形象:每一部作品都在自己内部把伊瑟尔所谓的‘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编入代码(encode),作品的每一种姿态里都含蓄地暗示着它所期待的那种‘接受者’(addressee)”。^{[5](P81)}也就是说,这种考虑应答的对话虽然是一种假想,但这种对话或者对话的预设是话语所必需的。

巴赫金考虑听者的应答性的时候,其实主要考虑的是听者的内在心理世界。而且,应答者在使用语词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对语词赋予了重要的情感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情感意义甚至比话语的字面意义更为重要。这时候,说话者考虑的是一种听话者一种独特的世界,一种独特的生活视野,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这时候,说话者,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不同的生命世界、不同的生活体验,不同的社会性杂语。话语主体在说出自己的话语之前,与他人所理解的世界相遇,而且要不断地融入他人的世界中,并生发出自己的话语。“话语的这种新的对话性,有别于在对象身上同他人话语相遇产生的对话性。这里不是对象,而是听者的主观视野,成为两者相逢的舞台。因此,这种对话性带有较多的主观心理性,而且时常具有偶然性;有时是硬扯在一起,有时是颇可争议的。”^{[3](P62)}话语具有对话性这是话语最为根本的特征。如果说话语在表称对象的过程中是与已有之言的对话。那么话语的应答性考虑的则是与未有之言的对话。

二、话语外在对话性与文学体裁问题

所有的话语具有对话性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种对话性的无可置疑主要是从话语的内在性

的视角来审视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何种体裁、何种用途的话语都具有内在的对话性。无论是科学话语、日常话语,还是艺术话语,都是如此。巴赫金发现,话语的这种对话性除了从内在性的角度来审视具有普适性特点外,有时还表现在话语的外部结构形式上。换句话说,话语在形式结构上,从是否吻合对话性的角度来看,具有非此即彼的两种形态。话语这两种基本的结构形式为:其一为对话性的结构形式,比如生活话语、论辩体等。其二则是与之相对的独白性的结构形式。

巴赫金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语言发现,语言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事实上同时存在着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其一是向心力,其二是离心力。同这种语言形成过程中的向心和离心的力量相对应的是,沿着向心的力量可能形成一种在语言或者思维上具有统一性的文学体裁,巴赫金发现,这种体裁以诗歌作为代表。与此同时,与那股离心的力量相一致的文学体裁则以小说为代表。在小说的话语中,往往没有一种一致性的语言,这些语言多姿多态、变化万端,谁都不占主导地位,谁都无法征服谁。这种语言形态与诗歌大异其趣。“在官方的上层社会和思想界里,当诗作正实现语言和思想世界在文化、民族、政治上的集中化时,在底层,在游乐场和集市的戏台上,人们却用杂语说着笑话,取笑一切‘语言’和方言,发展着故事诗、笑谈、街头歌谣、谚语、趣闻等等”。^{[3](P51)}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可以发现,诗歌这种体裁跟社会的文化力量的集中有关,诗歌发达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与政治中央集权最为凸显的时期,而小说这种体裁则跟文化力量的分化有关,小说越发达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与政治最为动乱或者民主的时期。

在语言形成的过程中,这种离心力和向心力从来都不是均衡地分布在具体的话语中的。在某些历史时期,离心力占主导地位,在另一些时期,向心力占主导地位。在一些体裁中,离心力占主导地位,在另一些体裁中,则向心力占主导地位。在巴赫金的话语理论中,离心力的另外一个表述就是对话性,向心力对应的另外一个表述则是独白性。从这种视角去审视文学体裁问题,在我们看来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巴赫金也正在这个层面上去重新反思以前的体裁理论。巴赫金在他的话语理论视域中发现,传统的文学话语或者文学体裁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静止的语言学研究,是一种语

文学传统下的产物。这种修辞学研究根本就不能探明文体之间的内在规定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修辞学只是书房技巧的修辞学,忽略艺术家书房以外的语言的社会生活,如广场大街、城市乡村、各种社会集团、各代人和不同时代人的语言的生活。修辞学接触的不是活的语言,而是语言的生理上的组织标本,是服务于艺术家个人技巧的语言学上抽象的语言。”^{[3](P37)}这种修辞学研究与文学话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语言存在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巴赫金看来,语言作为一种活的话语形式,从具体的声音形象到抽象的意义体系都具有社会性。话语从本质上具有对话性,因此,巴赫金认为用话语的这种对话性来重新透视文体问题可以揭示各种文学话语在文体方面的内在的质的差异。

20世纪以前,在西方的诗学中,小说语言从修辞学的角度看,其作为艺术语言一直没有得到认可。20世纪以前的诗学理论都是以诗歌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这跟西方文化的贵族传统与理论的宫廷化有关。20世纪以前的诗学理论能够发现诗歌与小说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别也是显然的,诗歌体裁的特征是“在大多数诗歌体裁中,语言体系的完整统一,体现于其中的诗人语言个性和言语个性的完整统一(这里的个性并且是独一无二的),这两者是诗歌风格必备的前提。”^{[3](P42)}但它们无法给小说一个合理的学理说明。正因为,这种诗学理论是在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的基础上得出的。所以与其为基础并为其服务的语言修辞学也基本上只关心诗歌。它们关于诗语的一些基本修辞特征,也正是从诗歌中得出的。基于此,20世纪以前的诗学理论一般都不承认长篇小说的话语是一种艺术语言。这说明了这种对于语言作静止的修辞分析的诗学理论本身的局限和阐释力的匮乏,而且对于小说这种体裁尤其是长篇小说,它们往往都显得无能为力。传统的修辞学的那些理论范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适用于小说的话语。在这种诗学理论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以前,在这种诗学理论缺乏反思自身理论局限的前提下,小说语言作为艺术语言即诗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承认。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局限性,20世纪以前的主流诗学理论都不能从根本上阐释小说话语的修辞特征,甚至还认为小说修辞这种提法本身可能是个伪问题。

巴赫金发现,传统的修辞学研究仅仅是对文学话语作切分式的以片断为基本单位的研究,而不是将整个文学文本进行整体的观照,犯了以部分代整

体的错误。如果对文本作整体的观照,就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在修辞上的显著差异。从这个角度看,统一在长篇小说这个整体中的各种话语存在着十分突出的对话性的特点。在这个整体中,各种语体杂糅相伴、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并存,相互激烈辩论。而且,这里面的各种话语或者声音很难用一种整齐划一的标准对其进行修辞分析。但这些特点性质迥异的话语通过相互的对话,它们最终统一于长篇小说这个艺术整体。在这一点上,长篇小说是同诗歌有着根本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构成了长篇小说话语的修辞特点。因此巴赫金说:

小说的风格,在于不同风格的结合;小说的语言,是不同“语言”组合的体系。小说语言中每一个分解出来的因素,都是在极大程度上受这个因素直接从属的那个修辞统体左右,如主人公独具的个性的语言,如叙述人的生活故事,如书信等等。这个关系最近的修辞统体,决定着每一个因素(词汇、语义、句法等因素)的语言和修辞面貌。与此同时,这个因素又同自己最亲近的修辞统体一起,参加到整体的风格中,本身带有该整体的色调,又参与形成和揭示整体统体的文意。^{[3](P40)}

在小说的话语中,各种不同的言语体裁,各种不同流派的话语、各种不同身份人的话语、各种不同情感色彩的话语、各种不同职业处境人的话语,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话语、历史的话语与现在的话语在小说的话语中你方唱罢我登台,他们众生喧哗,展开积极的辩论。在语言的体裁、形式存在上展开积极的对话,形成一种不同于诗歌这种内部统一体的独特的对话性特征。“不同话语和不同语言之间存在这类特殊的联系和关系、主题通过不同语言和话语得以展开,主题可分解为社会杂语的涓涓细流,主题的对话化——这就便是小说修辞的基本特点。”^{[3](P41)}不同于话语内在的对话性,这是小说中不同语言构成的对话。这种语言内部的分化,多语型、多声部、多体式等各种体裁的杂语现象既是小说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小说好坏的一个重要的参照。

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启示着我们,要将小说家语言风格和小说的风格区别开来。传统修辞学的错误在于将作者的语言修辞特点等同于小说的修辞特点,这是一种概念的偷换。第二种偷换是,以小说的某一从属部分的风格等同于小说的风格。比

如有人将长篇小说的风格归入史诗风格就是。在巴赫金看来,小说中的各种话语成分只能在相互的对话中才能彰显自己的修辞特征,一旦停止了这种对话,对各种成分作孤立的分析,那么它的修辞意义就会发生改变,就不再是在小说中的原来的样子了。也就是说,小说中的语言只能将之放在同其他的话语处于对话性的状态下进行修辞分析才吻合它的本来面目。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指出,“小说修辞问题的现状十分清楚地说明,传统修辞学的一切范畴与方法,都无力驾驭小说语言的艺术特点、小说中语言的独特生命。”^{[3](P44)} 这些传统的修辞学的范畴与方法对于诗歌来说是有效的,但对于小说来说却是无能为力的。小说这种语言艺术样式“它最高程度地体现了文字技巧,并且给予异质以最高的地位。”^{[2](P292)} 但在传统的修辞学与语言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们却曾一度将小说这种文体视为非艺术文体,将之归入雄辩术。

20世纪以前以诗歌为对象总结出来的诗语观是有问题的,小说的修辞特征处在它们的理论盲区。面对这种情况,一种可能就是不认可小说的话语是一种艺术性的诗语,把小说话语从诗语中排除出去;另一种可能则是放弃以诗歌为对象的静止的诗语观,对诗学理论进行重构和调整。巴赫金显然走的是后一条道路,因为他发现,传统的修辞学是建立在一种静止的语言学、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的。它们审视的是语言的干尸,而不是活的语言即话语。因此从话语修辞而不是语言修辞的角度来看,小说的修辞特征和诗歌的修辞特征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呈现在外在结构上的特征是:诗歌的话语修辞特征是一种独白性的结构形式,而小说则是一种对话性的结构形式。“小说不允许独白,它坚持在现成体系所认可的文本与它所拒绝的文本之间进行对话”,^{[1](P336)} 这个外在的结构特征成为小说体裁区别于诗歌体裁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本质规定性。也只有这个特征的差异才是诗歌与小说在体裁意义上的差异,除此之外的差异都是具体的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文类意义上的差异。小说话语是由各种杂语构成,不像诗歌话语那样内部构成要素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整齐划一的修辞特征,这是小说成立的前提和基础。

总之,巴赫金以话语的对话性在结构形式上的呈现来对文学体裁进行分析具有很大的创造性,为传统诗学中的体裁理论开启了一扇新的视窗。传统的用静止的方法来分析话语的修辞特点的修辞

学,没法洞见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精妙的特点。只有转向话语修辞学,即从超语言学的角度,从言语交际的角度来看体裁问题,我们才可能发现传统修辞学不能发现的问题。巴赫金以对话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发现小说与诗歌一个重要的在体裁上的特征分野就是:小说话语在形式特征上具有对话性,是一种众声喧哗的话语效果,但诗歌却不具有这种对话性,在诗歌里面,话语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具有修辞上的统一性特点。巴赫金用对话性来分析文学体裁,洞见无疑是深刻的,同时对体裁理论也是一种巨大的推进。托多罗夫对巴赫金将对话性思想贯穿于文体研究的做法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巴赫金关于小说的理论思考不仅在人类学领域里达到了极点,而且由于它本身的结果,文学理论的研究再次扩大了范围。”^{[2](P173)}

三、话语对话性与人文科学的本质属性

在巴赫金的话语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话语的对话性思想是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核。在日后的相关学术研究中,巴赫金将他的话语的对话性思想进一步扩展到诗学等人文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中。这种话语的对话性思想成了巴赫金人文科学方法论,尤其是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支点。

依据超语言学关于话语的理解,巴赫金提出人文科学话语对话性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主要是针对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主义将诗学等人文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化的做法,“关于文学研究,形式主义者已阐明了经验论的两种形式。……他们试图将作品局限于语言学结构;有可能的话,再将语言学结构限定在发音的范围内。”^{[2](P200)} 巴赫金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样做扼杀了诗学等人文科学自身的本质特征,不利于揭示诗学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简单化之嫌。如果回到文学与艺术接受、传播的本身,那些形式主义诗学的弊端与局限可能就会立马凸现。对于文学艺术的研究在巴赫金看来绝不可将之作静止的封闭研究,因为,在巴赫金看来艺术是一个产生于交往过程中的事件,“是作品与其读者之间价值的碰撞。”^{[1](P245)}

基于此,巴赫金认为人类的学术研究不能用仅有的一种范式来对待,就大的方面来说它们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其一是人文科学研究,其二是自然科学研究。这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有着各

自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研究任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两大基本研究类型可以说是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很难实现真正的融汇贯通。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自然科学要研究的是物,但人文科学要研究的则是人,且这种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物质存在,而是通过话语而存在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人文科学的对象,是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6](P2)}。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则是物,一种与人的主体性无关的客体性,巴赫金进一步指出:“精密科学(即自然科学——引者注)是独白型的认识形态:即人以智力观察物体,并表达对它的看法。”^{[6](P379)}但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则不是一种独白型的认识形态,它考察的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会思想、会应答的人的全部的话语世界。“人文科学是研究人及其特性的科学,而不是研究无声之物的自然现象的科学。人带着他做人的特性,总是在表现自己(在说话),亦即创造文本(哪怕是潜在的文本)。如果在文本之外,不依赖文本而研究人,那么这已不是人文科学(如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6](P306)}一句话,在巴赫金看来,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这种人的存在是通过话语或者文本而存在的。所以人文科学研究的直接对象应该是人的话语或者文本。

正是研究对象的不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显示出了本质性的差异。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自然科学对于其研究对象的主要任务是对其进行准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中,研究主体把研究对象看作没有应答性的物体,主要是对物的各种特性进行描述和测验,“这里只有一个主体——认识(观照)和说话(表述)者。与他相对的只是不具声音的物体。任何的认识客体(其中包括人)均被当作物来感受和认识。”但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尤其是表征人的思想和价值存在的话语与文本,因此“主体本身不能作为物来感知和研究,因为他作为主体,不能既是主体而又不具有声音;所有对他的认识只能是对话性的。”^{[6](P379)}也就是说,人文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要将那些文本和话语当成有主体的话语和文本来研究,而且我们对这些文本和话语,不能用自然科学纯粹认知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因此,“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研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它想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但代价是失去了它的特点,忘记了它的客体不是一个客体,而是另一个主体。”^{[2](P199)}

巴赫金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更偏重于从理解的角度,这时“理解不再是认识方式,而是存在方式,是那个通过理解而存在的存在方式。”^{[7](P251)}因为只有从理解的角度,我们才真正地抓住了人文科学话语的内在特质,托多罗夫认为:“关于这一点,他(巴赫金)一直没有背叛狄尔泰、里尔克和马克斯·韦伯。”^{[2](P204)}在人文学科话语里曾经常使用的几个概念,譬如认识、说明、解释其实同自然科学的内在特质紧密相关。“认识”带有自然科学中实证主义的观照世界的原则,“说明”这个概念在现代更大的意义上跟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模型有关。而“解释”,则是体现仅仅将自己当主体,而把对象作为客体的一种方法论思想,巴赫金不无深刻地指出:“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6](P314)}

巴赫金强调对于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科学的研究,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应充分考虑到以文本与话语存在的人文科学话语是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的特点。托多罗夫在分析巴赫金时指出:

把他人(这儿指被研究的作家)当作客体,就是忽略了作者是创作主体、是一个说话者这个主要特征……但是,怎样才能让作者重新得到发言权呢?——承认我们话语的相似性,把并列的话语不是看作元语言或语言与物的并列,而是看作一种更亲切的讨论形式的典范:对话。^{[8](P100)}

进一步而言,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主体,我们不能说去认识一个人或者一个主体。认识,我们只能得到关于一个人、主体的外貌形状特征和物质存在样态,这种认识只能是形体学、体质学或者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思想、观念和灵魂上的人。也就是说,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将人作为对象来进行认识的途径,我们不可能走入一个人的内心的心灵世界,我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做到“认识”一个人。因此,对一个人的“认识”不是将人作为一个客体来审视,而是将人也当成一个跟认识主体一样的主体来理解。语言学模式由于完全排除作者等主体因素,使人文科学话语的研究具有了自然科学的特征。从语言到话语就是重新关注语言与主体的关联,强调人文科学话语的对话性。

总之,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中心以话语或者文本呈现出来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的科学。对于话语或者文本的理解是在一种主体间性的思想下来展开的。人文科学的研究面对一个文本,对这个文本

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和阐释,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即先在文本的应答,具有对话性。“这是两个文本的交锋,一个是现成的文本,另一个是创作出来的应答性的文本,因而也是两个主体、两个作者的交锋。”“文本不是物,所以绝不可把第二个意识、接受者的意识取消或者淡化。”^{[6](P305)}人文科学的话语和文本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一种理解的对象。“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两个主体。对客体不可能有对话的关系,所以解释不含有对话因素(形式上的辩证因素除外)。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对话性的。”^{[6](P314)}任何的理解不是认识,且“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对话性的。在对话中,理解和话语就像辩论一样是相对立的。理解是在寻找一个与发话者话语相对立的反驳。”^{[2](P204)}人文科学“无处不是实际的或可能的文本和对文本的理解。研究变成询问和谈话,即变成对话。对自然界我们不会去询问,自然界也不会对我们应答;我们只能对自己提出问题,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观察或实现,以此获得回答。而在研究人的时候,我们是到处寻找和发现符号,力求理解它们的意义。”^{[6](P317)}

巴赫金将话语具有对话性的思想引入人文科学,认为诗学等人文科学的本质属性是一种内在的对话性。巴赫金将一种对话的理解与客观的认识的分野作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本质属性的区分无疑是具有见地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诗学等人文科学的内在特质具有积极的意义。巴赫金将他的话语的对话性观点运用到剖析包括诗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内在属性方面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巴赫金的观念已经特别地吸引了那些20世纪末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交往与认同等问题联系紧密在一起的学者,他的著作既已经是

语言学的‘社会学转向’的一部分,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9](P64)}在某种意义上说,巴赫金关于人文科学话语具有对话性的思想开启了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与文论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对传统的认识论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一次重要的纠偏。

参考文献:

- [1] [美] 琳娜·克拉克, 迈克尔·霍奎斯特, 米哈伊尔·巴赫金[M]. 语冰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2] [法] 托多罗夫. 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 蒋子华, 张萍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 [3] [俄] 巴赫金. 小说理论[M]. 白春仁, 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4] [法] 米·森格利-马斯扎克. 作为结构和建构的文本[A]. [加拿大] 马克·昂热诺, 等. 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C]. 史忠义, 田庆生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 [5] [英] 特雷·伊格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6] [俄] 巴赫金. 文本、对话与人文[M]. 白春仁, 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7] [法] 保罗·利科尔. 存在与诠释学[A]. 洪汉鼎. 理解与解释[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 [8] [法] 茨维坦·托多罗夫. 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M]. 王东亮, 王晨阳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9] Janet Maybin. Language, Struggle and Voice: The Bakhtin/Volosinov Writings[A]. In Margaret Wetherell, Stephanie Taylor and Simeon Yates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C].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责任编辑: 陈伟)

On the Issues of Dialogism and Poetics of Discourse

—Research on Bakhtin's Discourse Theory(II)

LIU Han, SU Shi-la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core in Bakhtin's theory that discourse possesses the feature of dialogism, which is shown in two aspects. Firstly, when discourse is used to address its object, it produces dialogue with other discourses; secondly, the dialogism of discourse is presented with the precondition that the listener does exist, and its purpose is to acquire reply and dialogue. Based on whether dialogism is presented or not in structure and form, Bakhtin classifies text style into novel and poem, and he further thinks that compared with natural sciences, the essence of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poetics lies in that it takes discourse as its way of existence, and it has an internal dialogism.

Key words: Bakhtin; discourse; dialogism; novel; poem; social sciences